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3/38
8 February 199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12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
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与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的合作

秘书长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2/59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目 录

	段 次	页 次
导言.....	1 - 6	2
一、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2/59号决议收到的 资料.....	7 - 15	3
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采取的行动.....	16 - 20	4

附 件

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收到并处理的关于恐吓和 报复的指称.....	1 - 60	7
------------------------------------	--------	---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通过了第1992/59号决议,人权委员会在该决议决议中再次对经常听报的两种情况表示关注:一是个人和团体因寻求同联合国及其人权机构的代表合作而受到恐吓和报复;二是发生了一些事件;某些人士受到阻碍,无法援引联合国主持拟订的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程序。因此,委员会促请各国政府不要以任何行动来恐吓或报复打击:(a) 那些寻求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进行合作,或向它们提供证据或资料的人士;(b) 那些设法援引,或业已援引联合国主持拟订的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程序的人士,以及所有为此目的向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士;(c) 那些根据人权文书所定的程序提交或业已提交函件的人士;(d) 那些作为人权侵权行为受害者亲属的人士。

2. 委员会要求联合国人权机构的所有代表以及监察人权遵守情况的条约机构按其授权继续采取紧急步骤,帮助防止这类恐吓或报复的发生,并在它们各自提交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或大会的报告中继续提出恐吓、报复和阻碍援引联合国人权程序的事件者的指称,同时报导它们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

3. 委员会还要求秘书长提请这些代表注意本决议,并请他向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载入从所有有关来源收到的有关本决议第1段所提那些人士受报复打击的任何资料。

4. 非政府组织继续与处理人权问题的联合国机构积极合作,向它们提供有关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人权情况的资料。关心人权问题的个人、人权侵犯行为的受害者及其亲属,在揭发影响自己或其亲属人权的情况或事件,或者就他们的社区、国家或地区的人权状况提交报告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些资料。

5. 上述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是联合国人权机构的重要资料来源。如本项目下提交的前几次报告所述,处理人权问题的联合国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有关以下情况的报导:即人权侵犯行为的受害者、其亲属和朋友、这类侵犯行为的见证人、人权积极分子或一般的组织受到阻碍,无法向国内或国际的主管机构报告侵权行为,或者为报告或争取引用国家和国际机制而遭受报复。

6. 联合国机构一贯重申个人和组织有权报告他们目睹或影响他们自己或影响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侵犯人权行为,并有权采取行动,防止他们受到恐吓和报复。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如国际劳工组织,也采取了步骤,保护它们的消息提供者(见E/CN.4/1991/24,第4-23段;和E/CN.4/1992/29,第12-19段)。

一、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2/59号决议收到的资料

7. 根据第1992/59号决议收到的资料涵盖多种多样的情况,有的人所受到恐吓或阻挠,使他们无法引用国内或国际程序,有的人因这样做而遭到报复。

8. 对于受害者是直接与人权委员会各机构有联系的个人或组织的案件,一经要求,有关机构或负责委员会有关工作的代表便采取行动,对他们加以保护。属于第1992/59号决议范围的个人或团体提出紧急保护的要求后,委员会根据“及时干预程序”迅即加以处理,向有关政府发出紧急函件。根据本项目提交委员会的前一次报告(见E/CN.4/1992/25,第14-18段)对该程序作了论述。下面一节或本报告附件描述了1992年期间采取的行动,载述了案件的概要以及收到转交案件的政府提供的答复。

9. 对有些案件采取了行动,这些案件包括: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亲属及其法律顾问、人权保护和法律防卫组织的领导人和成员以及受害者亲属联合会、参与对向联合国人权机构报告的案件进行调查的官员、协助法官调查上述案件的证人或专家、定期就有关自己社区的人权问题向联合国提供资料的土著社区和宗教组织及协会的领导人和成员。

10. 根据第1992/59号决议转交的其他有关资料还有一些较一般性报告,这些报告论述对某些个人群体或汇报情况组织的成员的迫害和恐吓,也根据某种活动领域或国别情况分析这种恐吓或报复的原因和结果。一般来说,这些报告对保护特定个人不提出具体要求,而只是提出对上述群体或组织所犯的侵犯人权行为,并提醒国际社会有必要采取行动,普遍保护可能受这种恐吓或报复之害的人。

11. 这类报告指出,目前在许多地方,因种族对峙和分裂引起的白热化冲突,恐吓和报复的情况日益严重。报告还强调,人权局势报告所提供的数字不可能测量这种攻击和恐吓所带来的恐惧和自我克制的影响。报告还指出,记录正在从事政治宽放的国家的虐待情况有时比记录“闭关自守”的国家的虐待情况容易,因为后者很少公布或难以获得资料。

12. 安第斯法律工作者委员会哥伦比亚科提交了关于1979-1991年期间在哥伦比亚对法官和律师发生暴力事件的报告。关于对律师实行暴力的原因,报告引述的主要因素是因为受害者捍卫人权。报告提到的案件涉及为工会领导人或反对党成员辩护的律师,或者为据称公职人员卷入的案件提起人事诉讼或进行刑事调查的律师。

13. 赫尔辛基人权监督组织就1991和1992年发生于土耳其的攻击一些人权协

会事件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有许多协会经常向联合国人权机构提供资料。报告提到的案件有：1992年杀害土耳其人权协会一名积极分子的事件。他在1991年被安放在车中的一颗炸弹炸伤；还有另外三起袭击事件，一起是一名律师的车内被放入炸弹，另一起是土耳其人权协会成员的车内被放炸弹，再有一起是炸弹安放在该组织的办公室；1991年一些自称是警察的人杀害了土耳其人权协会迪亚尔巴克尔分会的创建人之一；有一份传单广为散布被该组织四名成员的死亡威胁；警察逮捕并殴打土耳其人权协会希尔纳克分会主席（他最近提供了关于在希尔纳克侵犯人权情况的资料）；袭击、搜查和关闭土耳其人权协会的办事处，以及逮捕因在土耳其人权协会安排的会议上发言的该组织成员。

14. 菲律宾被拘留者特别工作组就设在拉乌尼翁省的团体和机构受到迫害的问题提交了一份报告；受迫害的团体中有一个报告组织的地方分部，它长期来一直是联合国人权机构的消息来源。报告特别提到对这些组织领导人或成员的监视、审讯和据称的诬陷。报告认为，这种情况大大影响了有关组织和个人；但出于害怕报复，这些组织和个人无一个向法院提出控告。

15. 尼加拉瓜保卫人权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尼日利亚失踪情况的资料，该委员会报告说，由于在一次民主活动中举行了两天的和平抗议，军政府于1992年5月宣布对人权积极分子镇压，并付诸实施。一些人权组织的最著名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其中有四人被捕，并被带往无人所知的地点，另外三人躲了起来，因为警察要抓他们，他们的家也遭搜掠。在这方面，该委员会还报告了这三人失踪的情况，工作组已向尼加拉瓜政府转交了他们的案件。

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采取的行动

A. 人权事务委员会

16.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审议了扎伊尔的第二次定期报告。在审议期间，委员会成员请扎伊尔代表评论以下指称，即根据《任择议定书》向委员会写信的人在扎伊尔受到起诉；扎伊尔公民仅仅因为被发现拥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等文书而遭受酷刑和虐待。

17. 委员会成员对扎伊尔当局迟迟不答复扎伊尔公民根据《任择议定书》提交的信件表示关注。扎伊尔必须与委员会合作，提供所要求的资料，尊重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他们还强调扎伊尔公民致信委员会行使自己的权利，绝不应遭到报复(A/45

/40,第540和581段)。

B. 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18. 恐吓和报复行为仍然影响着失踪人亲属和人权组织的基本权利,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对此深表遗憾。特别是,工作组对有些国家的政府实际上阻挠证人接近在进行国别访问的联合国人权机构的代表一事感到关注。

19. 在再次请非政府组织加强注意“及时干预”程序的同时,工作组促请有关政府采取特别措施,保护参与调查失踪案的个人和团体,并及时全面地调查对他们可能产生或已经产生影响的任何行为(见E/CN.4/1993/25)。

20. 1992年期间,根据委员会第1992/59和1992/30号决议,工作组实行“及时干预”,致函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秘鲁等国政府。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保护失踪者亲属、失踪者组织的成员和为他们辩护的律师,以及失踪事件的见证人或因报告或调查失踪案件和/或公开谴责此类案件而受到威胁或打击的人。

C. 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

21. 特别报告员在他提交给委员会的报告中,感谢向他提供与他任务规定有关的指称的所有非政府组织,这为他的工作奠定了基础。特别报告员说,提供材料的组织日益增多,他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他感到有责任鼓励新的人权组织引用保护人权,特别是保护生命权的国际程序。

22. 在40多起案件中,特别报告员提醒有关政府注意人权委员会第1992/59号决议所载的义务,即切实保护那些援引联合国人权程序提供证据、证词或法律援助的人以及人权侵犯行为受害者亲属的生命权。

23. 在向有关政府转达这些案件时,特别报告员促请它们切实保护受到生命威胁或死亡威胁等打击的人的生命权和人身安全,并要求获悉在这方面采取的步骤以及主管当局进行调查的进展和结果。特别报告员请各国政府注意有关的国际原则和准则,特别是第1992/59号决议。向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以色列、墨西哥、秘鲁、卢旺达和斯里兰卡等国政府送交了“及时干预”函件。

24. 除本报告附件所载的“及时干预”函件以外,特别报告员还请有关政府注

意记者被杀害的证人的案件,据报导证人与丈夫一起被秘鲁的一个行刑队杀害;特别报告员也请有关政府注意参与对 El Nilo 屠杀事件进行独立调查的一些律师和一名人类学者的案件,他们被据称与政府保安部队有关的武装人员杀死在哥伦比亚的卡利和巴列的家中(E/CN.4/1993/46,第206和477段)。

D. 缅甸人权情况的特别报告员

25.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12月访问缅甸期间正式要求会晤若干人士,他希望与他们就其授权有关的问题进行讨论;特别报告员没有获准会见这些人。据报导,情报处的成员访问了其他表明要与特别报告员接触的人员,并告诉他们不要与特别报告员和陪同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建立联系,也不要接受他们提出的联系。对于这种情况,特别报告员致函缅甸政府,他在函件中提到了第1992/59号决议,声明凡希望与联合国人权机构合作的人,均不应受到任何威胁或恐吓,政府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保护这些人的生命和人身安全。政府答复说,政府与联合国的合作不能导致超越《联合国宪章》所载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各国内政的基本原则。政府否认特别报告员信中所载的指称。政府认为,不能将“被告告诉不要见特别报告员”解释为“威胁或恐吓”。

附 件

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收到并处理的关于恐吓和报复的指称

A. 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见E/CN.4/1993/25号文件)

巴 西

1. 1992年7月26日,有11名儿童从里约热内卢州 Mage 的一个农庄“失踪”,其中有些儿童的母亲,即 Marilene Lima de Souza, Vera Lucia Flores, Edneia da Silva Eusebio, Denise Vasconcelos, Euzilar Joana da Silva Oliveira, Edneia Santos Cruz 和 Teresa Souza Costa 被一批据认为与官方力量有关连的武装人员绑架,并因揭发绑架事件和积极参与一项调查活动而受到死亡威胁(第93段)。

2. 政府就保护这些母亲所采取的措施提供了详细情况,因为她们揭发绑架事件并参加调查活动,她们的生命安全可能受到威胁。虽然根据推断,她们的生命没有受到迫在眉睫的严重威胁,但警察得到指示,一旦需要,必须提供进一步的保护。

哥伦比亚

3. 失踪者亲属组织的成员 Maria Nodelia Parra据报导在1992年6月受到军事法官的威胁,她被军事法官传唤为据称 Luciano d' Ihnyar 陆军部队士兵杀害四人的案件作证(第163段)。

4. 政府通告说,除其他事项外,对于受害者亲属、人权侵犯行为见证人、人权组织的律师和成员受到威胁的骚扰的问题,只要负责保卫、保护和促进人权的总统顾问办公室获悉国家或国际机构以及有关人员对所受威胁或报复有任何控告,它必然与国家调查和安全机构接触,并研究各种保护措施和机制,以便根据请愿者认为适当的办法提供最合适的保护制度。

厄瓜多尔

5. 据报导,1992年1月,保卫儿童国际法律社会保卫项目负责人 Cesar Anibal Banda Batallles 以及全基督教人权委员会律师 Ramiro Honorato Roman Marques 收到了匿名的电话死亡威胁,警告他们停止介入 Carlos Santiago 和 Pedro Andres Restrepo Arismendi(分别为17和15岁)的失踪案。还据报导,另外两名律师,以前曾代表 Restrepo Arismendi 家族出庭,但因害怕报复而退出该案,因为据报导,他们不断受到一些人的监视,这些人不管从神色还是所使用的车辆来看,都似乎是便衣警察。还据称,他们受到穿制服警察和便衣警察的威胁(第199段)。

6. 政府答复说,国家警察和任何其他政府部门均未威胁这两名律师,相反地,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保护这两人的生命。政府还告知工作组,对被认为卷入失踪案的一些国家警察成员提起了诉讼。

危地马拉

7. 据报导,Diego Domingo Martin 的家庭成员在汇报他们的亲属自1991年11月8日以来下落不明时受到负责 Huehuetenango 人权事务的副检察长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威胁。据称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提出控告,他们可能遇到失踪者的同样下场,他认为该失踪者是游击队员。据称失踪者亲属还受到民防巡逻队的威胁(第232段)。

8. 1992年1月31日,危地马拉全国遗孀协调委员会的成员和危地马拉失踪者亲属组织,即争取及我们的亲属生还互助组的成员 Rosa Pu Gomez,据报导被一个人用枪口指着警告她停止在上述组织的工作。根据报导,一名穿制服的警察经过时与该人友好交谈,警察似乎认识该人(第232段)。

9. 据报导,1992年10月12日,一颗炸弹在互助组办公室爆炸,该组织领导人 Juana Contreras 受伤。在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星期,互助组成员报告说,他们的办公室受到监视,还受到匿名电话的威胁。据报导,爆炸事件发生后不久,四名没有自报身分的武装人员审问了互助组成员,让他们说出该组织的领导人和活动(第232段)。

10. 少数民族社区理事会是一个经常向工作组报告失踪案件的组织的其主席 Amilcar Mendez Urizar 教授自1988年来收到了10次死亡威胁。据报导,1992

年5月10日,有人向他的屋子里扔进了一颗手榴弹。当时他不在家,他的家属没有受伤,但爆炸对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据报导,在这次袭击前不久, Urizar 先生几次接到电话死亡威胁,事件发生后两小时,他接到一次电话“警告”(第232段)。

洪都拉斯

11. 据报导,1992年3月25日,据查明是国家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手持武器企图杀害洪都拉斯保卫人权委员会奥兰乔地区分会主席 Antonio Zelaya Reyes, 因为该组织经常与工作组合作。据报导,在袭击发生前48小时,有人间接警告 Antonio Zelaya Reyes, 说他的生命有危险。圣佩德罗苏拉的洪都拉斯保卫人权委员会两名工作人员也据报收到同样的威胁(第261段)。

秘 鲁

12. 以下四人据报受到袭击和死亡威胁,据称是因为参加了对1991年7月4日14名圣巴巴拉农民失踪后被杀的司法调查,工作组应几个地方非政府组织的要求对这一案件采取了行动:

- (a) 据报导,1991年7月10日,万卡维利卡省一名州检察员 Luz Gladys Roque Montesillo 的年仅20个月的女儿 Cynthia Themys Quesada Roque 受到射伤,据称是一名警方人员向他和他的母亲乘坐的汽车开的枪;
- (b) 据报导,1992年7月28日,万卡维利卡公共事务部办事处法律助理 Ines Sinchitullo Barboza 的家挨炸。据称该事件可能是保安部队所为;
- (c) Eduardo Rojos Laysequia 也是万卡维利卡的州检察员,他也收到据称是与保安部队有联系的人员的死亡威胁;
- (d) 万卡维利卡一名州检察官, Manuel Antonio Cordova Polo, 据称在1992年2月19日受到万卡维利卡省 Angaraes 的 Lireay 军事基地的三名武装军人的死亡威胁。Cordova Polo 先生曾就圣巴巴拉的杀人事件控告万卡维利卡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指挥官和其他官员犯杀人罪(第390段)。

13. 据报导,1992年9月, Angelica Mendoza Almeida de Ascarza 因受一些人权组织的邀请去欧洲国家旅行,从事她过去十年来一直参与的对秘鲁失踪事件的

调查而被控“国际颠覆宣传”罪。她是一名失踪人员的母亲、全国紧急状态地区被绑架和失踪的被拘留者亲属协会以及和平与正义事务机构的主席,这两个组织经常向工作组转交资料,她也是工作组1985和1986年访问秘鲁期间的证人(第390段)。

14. 政府答复说, Angelica Mendoza Almeida de Ascarza 被控扰乱治安(恐怖活动),对她发布了拘留令。但根据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要求,内政部对Mendoza夫人采取了保护措施。

B.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
(见文件E/CN.4/1993/26)

哥伦比亚

15. Margarita Agudelo Alzate, Cesar Chaparro Nivia 工会会员和爱国联盟活跃分子的夫人及其兄弟 Hernando Agudelo Alzate 据报导于1992年3月18日受到死亡威胁。据说,对他们的威胁是因为他们报告了1992年3月4日 Cesar Chaparro Nivia 的死亡事件,据称,此人的死亡是由于在波哥大的一个国家安全部门受审讯期间对他实施酷刑所致。

危地马拉

16. David Estuardo Mejia Paz, 17岁,据报于1992年3月12日被一些武装人员绑架,他们对他威胁和审讯,要他说出他的兄弟 Axel Mejia Paz 的去向,他兄弟是教友盟约会的一名街头教育家,该会经常向联合国报告流浪儿人权受到侵犯的案件。Axel Mejia Paz 是对保安部队各分队26名成员诉讼的主要证人,这26名成员被控于1991年11月7日在教友盟约会所辖的庇护所前殴打流浪儿。从此以后,他和他的家属据报不断受到据称与保安部队有关的人威胁和骚扰。

C. 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
(见文件E/CN.4/1993/46)

巴 西

17. Marilene Lima de Souza, Vera Lucia flores, Edneia da Silva Eusebio, Denise Vasconcelos, Euzilar Joana da Silva Oliveira, Edneia Santos Cruz 和 Teresa Souza Cocfa, 1992年7月26日从里约热内卢州 Mage 的一家农庄失踪的11名儿童中其中一些儿童的母亲,她们被一批武装人员绑架,并因谴责绑架行为和积极参加一项调查活动而受到死亡威胁(第126段)。

18. 政府答复说,已采取措施保护这七名母亲的生命。警方进行了调查,对五名民警和宪兵提出控告,其中三名在1992年5月1日前被逮捕。后来该案转交给司法部门。里约热内卢州民警局秘书采取了必要步骤,对 Edneia Santos Cruz 和 Sonia Cristina Lourenco 给予警察保护,(她们的名字未曾向特别报告员通告),因为她们认出了被控绑架儿童的几名宪兵。另外六名妇女虽然不可能在正在进行的调查中作证,但也对她们提供了警察保护(第134段)。

19. Carlos Alberto Ivanir Dos Santos 在整个1992年屡次受到死亡威胁,他是 Articulacao de Populacoes Marginalizadas (CEAP)的执行董事,该组织向联合国人权机构提供资料,他也是里约热内卢 CEAP 总部的一名人权工作者。据报导,1992年6月13日,有人威胁他说,如果他不停止揭露对流浪儿的暴行,就要他的命。1992年8月24日,据称一名宪兵向 Dos Santos 先生开枪,该宪兵控告他贩卖毒品。据报导子弹没有射中他(第126段)。

20. 政府答复说,在民警的保护下由军方对 Carlos Alberto Javier 案进行调查(第135段)。

21. Jorge Antonio de Oliveira Filho 于1992年11月5日死亡,死亡情况表明与警方有牵连,此人为巴西社会保健革新协会的一名街头教育家,该组织也参与流浪儿方面的援助和活动,还向联合国人权机构提供资料。他死之后,该协会成员和流浪儿每天在巴西社会保健革新协会受到进一步死亡威胁(第126段)。

智 利

22. 据称,1992年1月29日,长期以来一直与联合国人权机构合作的组织,即保卫人民权利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受到死亡威胁。据报导,在这一天,称为“民族主义战斗阵线”的一个准军事集团成员冲进智利圣地亚哥的保护人民权利委员会办公室。据报导,这次袭击以后,保护人民权利委员会受到该集团九次威胁电话(第170段)。

哥伦比亚

23. Blanca Cecilia Valero de Duran, 据报于1992年1月29日在巴兰卡维梅哈被暗杀,他是 Magdalena Medio 人权委员会分会的一名秘书,该组织就侵犯人权行为向联合国人权机构递交报告。据说,该人权委员会主席 Jorge Gomez Lizarazo 受到一些准军事集团的死亡威胁(第196段)。

24. 政府答复说,关于 Blanca Cecilia Valero de Duran 案,为查明杀害她的策划者和执行者而采用了一切调查手段。在巴兰卡维梅哈,她的尸体被从墓中掘出,并记录了25人的证词。但1992年1月29至31日的罢工阻碍了巴兰卡维梅哈初步调查组进行的调查(第211段)。

25. 1992年6月又有报导说,该人权委员会成员,包括Jorge Gomez Lizarazo、Rafael Gomez Serrano 和 Joel Quiroga 受到死亡威胁和攻击。此外,前人权委员会成员 Julio Cesar Berrio Villegas, 以及 Ligia Patricia Cortez 据说分别于1992年6月28日和1992年7月30日被一些与保安部队有关的不明身份的枪手杀害。据报导, Humberto Hernandez 于1991年3月在同样情况下被杀,他也是人权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第201段)。

26. 政府答复说,保安机构在1992年2月10日之前对人权委员会的 Jorge Gomez Lizarazo、Rafael Gomez Serrano 和 Joel Quiroga 提供了人身保护。哥伦比亚政府还告知特别报告员,1992年9月初对 Jorge Gomez Lizarazo 及其家庭成员加强了保护,现在有国家安全部的四名侦探和 Fiscalía Regional del Cuerpo Tecnico de Investigacion 的四名特工人员给予保护。据说一名侦探在1992年6月11日有人对 Jorge Gomez Lizarazo 的一次攻击中受伤(第211段)。

27. Cesar Chaparro Nivia, 工会成员和爱国主义联盟积极分子,据报导于1992年2月29日被国家安全部的一些成员拘留,1992年3月4日死亡,据称是在波哥大

的国家安全部审讯期间对他实行酷刑所致他的夫人 Margarita Agudelo Alzate和她的兄弟 Hernando Agudelo Alzate 据说在向哥伦比亚总检察长报告了他的死亡后受到死亡威胁(第198段)。

古 巴

28. Juan Betancourt Morejon 据报导于1992年2月21日在哈瓦那的街上被两个人上来用左轮手枪对准他的头部扣动扳机,告诉他如果他继续从事人权活动,下一次枪膛将装上子弹。他是古巴人权党的秘书长,该组织就古巴的人权情况向特别报告员提供资料。据称,围攻者与国家保安部队有关系。Jorge Amores Diaz, 古巴人权党副主席,据报导于1992年2月在哈瓦那的街上被两名国家高级保安官员拦住,以死亡相威胁(第222段)。

29. 政府答复说,关于 Juan Betancourt Morejon 和 Jorge Amores Diaz 两案的指称属不实之词。Betancourt Morejon 于1992年4月24日离开古巴, Amores Diaz 于1992年7月离开古巴(第226段)。

萨尔瓦多

30. 全国新教教会理事会的下列11名成员于1992年1月7日收到一个称为“全国秘密救世军”的准军事集团的书面死亡威胁,该集团指控他们在武装冲突期间向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提供经济和后勤支助,全国新教教会理事会为宗教团体,关注人权问题,向联合国人权机构提交报告。这11名成员是: Victoriano Jimeno, Medardo Gomez, Hugo Magana, Flora Carolina Fuentes, Carlos Najera, Roberto Palacios, Julio Cesar Grande, Igancio Meza, Santiago Flores, Luis Serrano 和 Angel Ibarra。据称, Robeto Palacios 和 Ignacio Meza 在以前也屡次受到威胁(第245段)。

31. 1992年3月下旬, Lucia de la Paz Bonilla 受到死亡威胁,她是 Nazario de Jesus Gracias 的母亲,她的儿子是一名工会会员,据称于1992年3月2日被据说与萨尔瓦多武装部队有关的行刑队成员暗杀。Nazario de Jesus Gracias 案以前曾提交给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据报导, Lucia de la Paz Bonilla 在联合国萨尔瓦多观察团的成员对她儿子的案件进行调查期间会见了他们,随后两名被认为属于政府部队的武装人员访问了她(第245段)。

32. Salvador Ivan Ramirez 是萨尔瓦多工人全国工会联合会处理冲突问题的秘书,据报导于1992年7月31日被杀害。据说一个名叫“白手”的行刑队对杀害 Salvador Ivan Ramirez 负责,据报导,他自从1991年流亡归来后屡次收到死亡威胁(第145段)。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将该案转交给了萨尔瓦多政府。其后,萨尔瓦多工人全国工会联合会其他成员,包括秘书长 Juan Jose Huevo 以及 Miguel Alfredo Ramirez 也据称受到死亡威胁。

33. 政府答复说, Salvador Ivan Ramirez 于1992年7月31日在 Redondel Masferrer 的“El Portal”自助餐厅被 David Armando Fiores Romero 杀害,后者于1992年8月27日被警察逮捕,并由一些目击者指认。据说他承认出于个人原因而杀人(第248段)。

34. 据报导,1992年10月31日, Jose Eduardo Pineta Valenzuela 遭谋杀未遂。其前不久,他作为萨尔瓦多检察长办公室人权司的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审判被控于1989年谋害六名耶稣会牧师和两名妇女的九名军方人员,之后,又参加人权调查专员办公室对同案的调查工作。Jose Eduardo Pineta Valenzuela 的夫人因这次谋杀未遂事件而受伤,仍然半身不遂。据报导,1992年8月17日,同一批武装人员威胁她说,如果她与调查该案的人员合作,就要她的命(第245段)。

35. Cesar Vielman Joya Martinez 于1992年10月23日被美利坚合众国当局引渡到萨尔瓦多,关押在 Mariona 监狱。要求对他的生命加以保护,因为他不断自称曾参加过萨尔瓦多军队的一些所谓“行刑队”,他拥有的材料据说可用来控告军队和保安部队的各类成员。他向被迫或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提供了证词(第246段)。

危地马拉

36. Myrna Mack Chang 是科学发展研究所所长和著名人权工作者,于1990年9月被刺杀,其亲属于1991和1992年收到匿名死亡威胁,为自己的安全担忧。另外一些参与调查该暗杀事件的人于1991年被杀害(第242段)。

37. Florencio Coj Garcia、Guadalupe Coj Garcia、Manuel Chingo de la Cruz、Mariano de la Cruz 和另外11个人,均为基切省 Zacualpa 市 Tunaja 的基切土著社区成员,据报导于1992年1月受到军方人员的威胁,因为他们挖掘了 Tunaja 的一些秘密墓地,据说墓地中埋有失踪和即决处决的受害者。他们着手在这一地点挖掘,是为了寻找1991年12月失踪的社区成员(第242段)。

38. 政府答复说,关于 Turcia 基切土著社区的 Florencio Coj Garcia、Guadalupe Coj Garcia、Manuel Chingo de la Cruz、Mariano de la Cruz 以及其他成员的案件,调查结果表明,主管法院没有开展过司法诉讼程序,因为对指称的威胁没有提出过正式控告。

39. Maritza Urrutia Garcia 据报于1992年7月23日在危地马拉市被武装部队一些成员绑架,其亲属据称受到保安部队人员的死亡威胁。他们表示对自己的安全担忧(第284和285段)。

40. 1992年1月26日,危地马拉国家工人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 Armando Sanchez 据报导收到一份由自称“反共产主义小组”的行刑队签署的死亡威胁传单。传单还威胁下列人员:少数民族社区理事会主席 Amilcar Mendez Urizar、UNISTRAGUA协调员Byron Morales、危地马拉全国遗孀协调委员会主席 Rosalinda Tuyuc、争取我们的亲属生还互助组主席 Nineth Montenegro de Garcia 以及农民团结委员会领导人 Juau Mendoza。1992年1月31日,危地马拉全国遗孀协调委员会

成员 Rosa Pu Gomez 据报导在街上受到一名武装人员的威胁,该人指责她参加游击队(第273段)。上述组织都经常就即决处决、失踪和酷刑问题向联合国有关机构报告。

41. 据报导, Amilcar Mendez Urizar (见以上案件4)的夫人 Maria “Myriam” Buthy Dardon Tejada 和她的其他家庭成员自1992年10月下旬以来屡次受到死亡威胁和骚扰(第289段)。

42. 政府答复说,关于 Rosa Pu Gomez, Rosalinda Tuyuc, Nineth Montenegro de Garcia, Amilcar Mendez Urizar, Byron Morales, Armando Sanchez 和 Juan Mendoza 等人的案件,调查结果表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人受到死亡威胁。只有 Amilcar Mendez 不断声明他受到威胁;但要他向法院提出正式控告时,他说没有时间。在争取查明威胁来源方面,他没有与当局合作(第296段)。

43. 据报导, David Estuardo Mejia Paz 于1992年3月12日被一些武装人员绑架,他们盘问他兄弟 Axel Mejia Paz 的下落,他兄弟是教友盟约会成员,曾几次受到死亡威胁。Axel Mejia Paz 是诉讼被控于1991年11月7日殴打三名儿童的保护公民组织警察分队13名成员的主要证人(第277段)。

44. Londy Urizar 是教友盟约会接待员,据报于1992年5月8日在该会行政办公室收到死亡威胁的匿名电话。据称,这些威胁,还有在这之前发生的一些事件,均与指责保安部队成员侵犯流浪儿童、教友盟约会及其活动支持者的人权有关(第278

段)。

45. Jose Alberto Nerio Osorio 据报导于1992年5月17日,遭到被认为与保安部队有关的一些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谋杀未遂,他是研究、调查和促进人权中心的教师和代表,该组织向联合国人权机构提供资料(第279段)。

46. 1991年8月,在埃斯昆特拉省的 Puerto Quetza1 发现了11个人的尸体,其中一人的母亲 Adelina Lopez Castillo 据报导受到军方的死亡威胁,因为她控告6名士兵,认为他们要对杀害这11人负责。其他家庭成员也据说受到威胁(第281段)。

47. 危地马拉大主教人权办公室主任 Ronalth Ivan Ochaeta、少数民族社区理事会主任 Amilcar Mendez Urizar以及研究调查和促进人权中心主任 Factor Mendez Doninelli, 据报导于1992年11月被危地马拉当局指控与游击队有联系。所有这些组织经常与联合国人权机构合作。据说这类指控使他们的生命严重受威胁,因为行刑队已杀死了几名被指称与反政府武装集团合作的人权领导人和活跃分子(第228段)。

48. Manuel Chumil Mendez (17岁)、Consuelo Ruiz 和 Maria Luisa Ruiz, 均为争取我们的亲属生还互助组成员,他们据报导于1992年3月20日在奇奇卡斯特南戈的 Sacpulp 受到当地民防巡逻队队长的死亡威胁(第282段)。

洪都拉斯

49. Antonio Zeleya Reyes,是洪都拉斯保护人权委员会奥兰乔地区分会主席,在收到死亡威胁的电话后,有人在1992年3月25日试图杀害他。行凶者据说已查明,是国家调查局的一名成员。洪都拉斯保护人权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也受到死亡威胁。洪都拉斯保护人权委员会是一个与联合国人权程序密切合作的机构(第326段)。

以色列

50. Ahmed Suleiman Musa Qatamesh 巴勒斯坦人,于1992年9月1日被捕,据称在拉马拉监狱拘押期间受到酷刑,其夫人就指称的他丈夫被拘留和受到酷刑的情况在耶路撒冷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据报导,两天后,她受到以色列安全部队的虐待和威胁(第382段)。

墨西哥

51. Maria Teresa Jardi 是墨西哥大主教管区声援和保卫人权部主任以及保持与联合国人权机构经常接触的奇瓦瓦声援和捍卫人权委员会法律顾问,据称于10月下旬收到死亡威胁。据称,有一次威胁涉及她对谋杀 Victor Manuel Oropeza Contreras 的调查(第419段)。

52. 墨西哥政府答复说,众议院一致驳斥对 Maria Teresa Jardi 的恐吓行为,要求主管当局彻底调查死亡威胁,并保障 Jardi 夫人及其家属的安全。众议院人权委员会也驳斥对 Jardi 夫人的恐吓行为。联邦检查署派出特工人员保护她的人身安全。1992年11月,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会见了 Maria Teresa Jardi,表示充分支持她查明责任者并绳之以法的努力。他还重申,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 Jardi 夫人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第424段)。

秘 鲁

53. Luz Gladys Roque Montesillo、Ines Sinchitullo Barboza 和 Eduardo Rojas Laysequia 等三人是万卡维利卡检察官办公室的官员,他们和 Angaraes 的省检察官 Manuel Antonio Cordova Polo 一起据说在1992年2月至7月间在不同场合遭到保安部队成员的威胁,据称原因是他们参与调查了1991年14位农民在圣巴巴拉被杀害一案。Cynthia Temys Quesada Roque (2岁)是 Luz Gladys Roque Montesillo 的女儿,据说在1992年7月她母亲遭袭击时受伤(第466段)。

54. 政府答复说,关于 Luz Roque Montesillo、Ines Barboza、Eduardo Rojas Laysequia 和 Manuel Cordova Polo 等人案件,在侵犯人权行为方面没有提出正式控告。提出指称的目的可能是要引起人们对圣巴巴屠杀事件的注意,否则该案的肇事者不会受法律制裁。Ines Sinchitullo Barboza 和 Cynthia Temys Quesada Roque 遭到袭击的事件得到了应有的谴责;无法证明军方人员的参与。此外,万卡维利卡当局提问了 Luz Roque、Manuel Cordova 和 Eduardo Rojas 等三人,向公共事务部汇报了他们渎职和支持光辉道路的行为(第479段)。

55. Jose Luis Marin Gonzalez 于1992年1月18日被 Aucayacu 军事基地的士兵逮捕,据报导于1992年1月27日发现了他的尸体,头部和双手已被砍去。据说他的双亲 Lince Marin Panduro 和 Emilia Gonzalez Guerrero 受到军方威胁,不得

报告他们的儿子被暗杀(第476段)。

卢旺达

56. Fidele Kanyabugoyi 据说在1992年8月下旬受到死亡威胁和骚扰,他是公共工程部的一名负责人和一个被称为 Kanyarwanda 的人权团体的成员,该组织提供在卢旺达侵犯人权情况的资料。1992年8月29日晚, Fidele Kanyabugoyi 的住宅据说遭到九名武装人员的袭击。几天前,他被最高上诉法院院长召见,要他解释他对1991年初 Bagogwe 部落的成员遭到大屠杀一案所作的调查,尤其是解释他的调查结果为何说一名当地政府官员卷入屠杀案。鉴于 Kanyabugoyi 先生以前曾从事人权活动而遭到骚扰,有人担心他的生命有危险(第503段)。

斯里兰卡

57. W.C.Neal Rajapakse 和 W. Charles, 一名据称于1990年9月遭警察强奸后被其法外处决的年轻妇女的兄弟和父亲,据说在1992年2月和4月间不断遭到 Anuradhapura 警方人员的威胁和恐吓,据称,这些人这样作的目的是使这两人不敢出庭提出不利于有关警官的证词(第535段)。

58. 政府答复说,关于 遭到恐吓 W. C. Nimal Rajapakse 和 W. Charles 和威胁的指称,负责 W. Chandrawathie 遭绑架、强奸和杀害一案的诉讼的国家律师告诉法院,一名证人曾控告说受到不相识的人的威胁。刑事调查局正在对此调查。刑事调查局还对 W. C. Nimal Rajapakse 遭到威胁的指称作了调查,调查表明,他因在法院附近对 W. Chandrawathie 一案的嫌疑人拍照而被叫住询问,但他无法证明他是记者。从他身上搜出一把刀子,刀子已开刃:其长度超出规定,因此他受到拘留。反颠覆股官员在调查后证实, W. C. Nimal Rajapakse 与颠覆活动无关。他被控携带超过规定的刀子,并已服罪。 W. C. Nimal Rajapakse 不是 W. Chandrawathie 一案的证人,对 W. Charles (W. Chandrawathie 的父亲) 遭到威胁的指称正在进行调查,已证实控告属实,并证明有正当的理由查出罪犯(第540段)。

59. 人权与发展律师组织在1992年6月和7月间据称不断受到保安部队人员的威胁。据称持枪者屡次到该组织的办公室打听总书记 Kalyanada Tiranagama 和一位名叫 Mohen Seneviratne 的法律工作人员的下落。据说该组织的印刷工人也受

到威胁,有人要他们停止印刷题为“人民权利”和“Vinishcaya”的通讯。该组织据说负责向人权遭受侵犯者提供法律咨询和协助,为公众执行扫盲方案,并向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提供资料(第536段)。

60. 政府答复说,鉴于人权与发展律师组织受到死亡威胁,警方向该组织办公室派驻了一名警卫。从此,该组织没有再提出过申诉。该组织的一名成员在1992年10月访问人权事务中心时证实了这一情况(第541段)。

XX XX XX XX XX